



谭桂林 著

◎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系列丛书

转型期 中国审美文化批判

江苏文艺出版社

B83-092

8

谭桂林 著

转型期

中国审美文化批判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 / 谭桂林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7

ISBN 7-5399-1648-6

I. 转... II. 谭... III. 审美-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5228号

书 名 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
作 者 谭桂林
责任编辑 郭济访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48-6/I·1551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冯光廉

4月下旬，当我和老伴从河南探亲刚回到家中时，即听女儿讲：桂林来电，说他有本新书即将出版，拟请我为之作序，并嘱我回来后尽快给他回话。目下我手中有两件急活要干：我参与主编撰写的近百万字书稿《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清样已来数日，才校对一部分；《试让青春多收获——与文科大学生谈学习和研究》初稿要修改定稿。眼力的不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又限制我的阅读和写作。而桂林要序文异常急迫（因出版社已排出清样，要求7月出书），即使近日能收到他的书稿清样，要在一周左右完稿寄出，时间委实太紧张了。我不是写作的快手，又不能开夜车（患神经衰弱，睡觉不好），怎么办呢？但桂林向来不向我提什么要求，尤其这分明是借以表达对我的尊重和厚爱……虑及这些，我便立刻回电曰：可以。然而序文如何写呢？最后的决定是：写我对他及翻阅书稿后的总体印象，而存留在我心中的，可能是相当粗疏的，并不怎么准确的。但限于水平和时间，也只能如此而已了。

桂林于1985年秋考进山东师大做硕士研究生时，无论是教学或研究，其领域大抵是局限在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1918—1949）范围之内的。这在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学界同仁大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他1996年提交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初稿中依然如此（1999年12月正式出书时增写了当代文学部分）。这其中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也有知识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今所看到的桂林新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则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学术格局，全面而系统地透视20世纪末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象。从书稿的内容目录可以窥见，桂林的学术视野已完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历史性拓展。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付诸相当巨大的投入。然而，收获也是丰厚的。在论及诸多问题时，他突破了30多年的狭小格局，而获得了20世纪带整体性的宏观学术眼光。在从现代到当代的学术拓展工程中，桂林所表现出的学术自觉性、主动性和刻苦性，显示出青年学人勇于开拓进取的良好素质和精神风貌。

论及桂林的学术格局的拓展，还应注意到他从文学到文化的突进。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不把文学拓展提升到文化的宏深空间，纯文学的研究既难以深化，也难以升华。桂林从纯文学—雅文学的研究，扩大到审美文化（包括文化思潮、理论批评、各种体式文艺创作、大众文化等众多类型层面）的整体观照，标志着他的学术视野的又一重大拓展。

桂林一入山师大即被分归我指导。当时我曾向他索要已发表的文字。他交给我一篇约四五千字的文章，是关于40年代国统区一部诗歌集的评论。文中虽不乏独到的感受和理

解，但总体观之，内容相当单薄，就诗集论诗集，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性和历史感都比较弱。3年读研期间所写的文章，进步相当大，但毕竟还显得较为稚嫩。如今通过对他的新著的粗略翻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学术深度和创造性方面的巨大推进。他超越了从单向层面观照文学的局限，而挺进到从复杂多维视角透视审美文化的深广空间。即使对或一具体文化现象的论述，也能贯通古今，比照中外，史论结合，给人以深切透辟之感。非常错杂的文化现象，非常纷纭的理论命题，经过他的梳理解析，大都能呈现出清晰明快、切入肯綮的理性风貌。鲜明的观点、热烈的爱憎与冷静的剖析、周密的学理相结合，赋予论著以理性的说服力和感性的感染力。“片面而深刻”曾是许多青年学者刻意追求和标榜的治学之路，记得桂林对之也曾一度关注过，首肯过，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不是值得向往和追求的学术正道，于是转而执著于以科学的思维方式，面对研究对象的本体特质，在整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潜心思考，做出自己的新的概括和评价，既尊重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又谨慎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显示出相当老练的学者风范。深刻独到的学术见地并不一定是片面的，在辩证整合和严守规范的前提下，建构属于自己的创造性学术命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这是获取学术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健康的成才之路。桂林的学术历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像桂林这种年龄的青年学者，在他们刚刚踏进学术门槛时，新理论新方法的热潮正蓬勃兴起，如火如荼。和许多年轻学者一样，桂林对这场思想文化潮流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不仅大量阅读了西方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当时中国文坛的介绍，并且在他那时所执笔撰写的论文里（如收在《中国

现代作家研究述评》中的《田汉戏剧研究：希望在审美向自身的回归》和收在《鲁迅与中外文化》里的《时代制高点上的伟大沉思》），颇为鲜明地显露出他对新理论新方法及其他西方理论著作的喜爱和接受。应该说，在当时的研究生群体中，他的表现并不是最激进的；在他此时的论文里依然保留着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论，对社会历史—美学批评的信赖和坚守，但也毋庸讳言，总的来看，他对新理论新方法是力求学习和运用的，甚至可以说这构成了他论著的重要指导思想 and 特点，就是在语言表述上，也明显打上了新理论新方法的印记，有些地方读起来相当生涩费力，亦有若干生硬套用之处。不过桂林是个长于反思和不断扬弃超越旧我的人。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热潮的退去和他自身知识理论素养的提高，他很快意识到新理论新方法的复杂性，需要认真严肃，全面对待。我的感觉是：他一方面洞察出新方法新理论的弱点和弊端，力求从显在的层面淘洗清除加在他论著中的诟病，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要摆脱灰色生涩的影响，使自己的表述变得明快、畅晓、犀利；另一方面他又精心过滤出新理论新方法的许多优长，注意从精神素养、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操作技法等层面吸取营养，以便使自己变得更丰富一些，更深刻一些，更开放一些，更个性化一些。这种严肃审慎的辩证态度和汰劣存优的思想智慧，既使他保持着新型学者的激扬蹈厉、新颖独具的风采，而同传统的治学之道迥然有异，也同不少生吞活剥、华而不实的新派人物严格区别开来。他的确相当成功地整合着新旧两类学术范式的优长，向着深厚犀利、明快畅达的学术风格靠近。“哲学的诗化，诗化的哲学”——他对此种学术品格和语言风格的刻意追求，似乎已沉浸在他论著的深层，哲理

化、情感化、审美化的意味，从他近年的论著中大抵不难捕捉得到了。

从1988年硕士生毕业到现在，桂林十年多的学术生涯，留下了勤奋执著、开拓进取的学术踪迹。他不断充实调整自我的努力和所结出的研究果实，从一个侧面代表着新时期年轻学者的成长道路和学术业绩，显现出改革开放时代所赐予一代青年学者的优惠和恩泽（虽然还不够充分）。这是足以使像我这样的年老学人所深感羡慕和高兴的。

桂林于今刚过不惑之年，他的人生之路和学术之路正长。我作为长者和不称职的硕士生导师，回顾了他的学术历程之后，还想提出若干希望，以供他跋涉前行时的参考。

我觉得，桂林经过前一时期的积累和磨练，已经做好了相当充分的承担更重大更复杂更艰难的学术研究课题的准备，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和本书的出版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有学者说它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但我总觉得对此不能估计过高。可以从整体的学科格局着眼，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科总体的需要出发，选择最迫切、最重大且自己最能适应的宏观性课题作为主攻对象，用三五年、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解决几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以推进学科的走向成熟。学问要愈做愈大，视野要愈放愈开阔，自我要求要愈来愈严格。不必追求成果数量，而重在学术价值的获得。学术价值的高低，永远同其重大繁难的程度（甚至还会带有某些风险）成正比。灵巧别致但却比较容易的课题，做起来是味道不足的。桂林应趁正年富力强，好好设计一个较长远的学术目标，拟定一个宏大而又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杜绝一切外在的诱惑，集中精力搞点较具斤两的东西，以不负国家、人民和学

友的历史重托，也不负自己的生命价值。人生的成败，有时简直就在关键时刻的一念之差。方向目标定准了，执着勤劳，孜孜不倦，会获取较为丰硕的成果的。这样，到 50、60 岁的时候，反顾走过来的道路，评估所拟就的计划，检阅所取得的成果，都会别有一种人生况味在心头，可以预见，那将是充实的，耐咀嚼的。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繁难程度高的选题规划是前提，而更精深更坚实的创造性开掘则是关键。老题新做也好，新题开创也好，无不要求精到、深厚、扎实、新颖，作出前所未有的建构，开辟新的学术天地。应该承认，当今所面临的重大学术课题无不带有复杂多样、错综多变的特点。这就需要从众多的视角层面进行周密的观照，大凡中与外、古与今、现在与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门类都必须贯通融合。尤其是对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分析把握，更需要很大的功夫，才能作出准确的概括。以本书所提及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而论，情况就极为复杂错综。处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已经并且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分化，走向边缘者（更多些）有之，进入权力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者（较少一些）亦有之。并且这种态势还时时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随着市民阶层（或曰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通过激烈的碰撞，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都会出现新的变化、新的调整、新的演进。纵观现代东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可以肯定地说，审美文化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多元互动，将是长期存在的格局和特点。大一统的单一审美文化君临一切的局面是难以出现的，实际上也未必是正常的。因为社会生

活的复杂多样性，人性的复杂多样性，人的思想文化素养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文学—文化的复杂多样性。我以为作此理解，在呼唤人文精神的时候，在倡扬知识者坚守理想、实施文化批判的时候，才能多一些宽容大度，多一些从容乐观，多一些坚韧沉毅。学术的深刻性、坚实性、全面性、创造性和前瞻性，也许能够取得更为切实的保证。

就桂林近几年撰写的代表性论著看，他在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写作方面，已开始较为鲜明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或者也可以说他在学术风格的创建上，已奠定了相当坚实稳固的基础。在我的印象中，他比较长于在发掘爬梳选择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以睿智的眼光对研究对象进行总体性的分类概括，并用缜密明快的思辩逻辑加以论证和阐释，提出较具雄辩性和征服力的独到见解，无论从正面阐释，或是从反面驳难，大都显示出高屋建筑的气势和潇洒豪壮的风姿，透露着若干的大气和厚重。语言的畅达，句式的灵活，文辞的激越，操作的轻巧，则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论著由理趣、情趣、审美交织而成的魅力。今后，如果他在理论观念的建构方面更精深独到一些，框架体系的创构更宏大完整一些，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更有机充分一些，风骨的蕴含更厚重坚挺一些，语言的运用更凝练壮美一些，那学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可能会更为可观。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学习借鉴吸收中外那些诗人哲学家和勃兰兑斯等大文学史家的经验智慧和风格特点，恐怕是大有助益的。

写到这里，我心中的不踏实感愈加浓重起来了。难道桂林学术的成长踪迹和现实状况真的如我所描述的这样？我所提出的几点希望是否贴切实用，有益于他今后的发展？我的确难以消除内心的疑虑和困惑。但我真诚的愿望和动机是，

作为一种粗浅的印象和看法，能够引发桂林和他同辈一些学者，在新世纪之初，认真思考自己已经走过的学术历程，进行一番理性的回顾和反思，计议一下今后的道路该怎样走，学术目标应如何定，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况且还有桂林和其他学者的指教与补正呢？想及此，我的心虑也就释然得多了。是为序。

2001年5月4日于青岛大学

引言 转型期人文精神的 自我拯救

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有时也是让人浮想联翩地巧合。每当世纪的航船快要驶入它最后的港湾时，总会有某种蕴蓄虽久却是突如其来的事件掀起惊涛巨浪，刺激着在世纪航船中昏昏欲睡的人们蓦然惊醒，在世纪末的隐约钟声中蹒跚起舞，重复地预习着世纪末来临的庆典仪式。90年代初那场匆匆而来但势头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可以说就是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就在这种令人喜忧参半的风声涛声之中，中国 20 世纪风尘仆仆创痕斑斑的时代巨轮也就拉响了它最后一程的第一声汽笛。世纪末，这个不知被人们说过多少次的话语，像一个狡黠的幽灵，又一次躲在仓皇无措的人们背后，挤弄着它那灿烂如花而又冷漠如铁的鬼脸……

毋庸讳言，人们现在通常以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标志世纪末的肇始，不仅是因为在时间的实际意义上，世纪末的

概念是指 80 年代末开始的最后十几年，而且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80 年代的政治躁热从高峰跌入平静的低谷，中国的社会改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我个人认为，这种深刻的变化虽然也波及政治，刺激经济，但更主要有力的是体现在文化的嬗变上。因为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向第三代领导人的顺利交接保证了政治体制的稳定一致性，而关于改革开放等政治话语的内涵外延，其权威阐释甚至具体举措并没有根本性的殊异。至于经济，高瞻远瞩而又痛切陈词的南巡讲话更是像消冰解冻的骀荡春风，激起一波又一波腾飞发展的巨浪。但是文化，尤其是与人们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审美文化，一夜之间犹如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精气瓦解，面目全非。过去为精英文化所拥有并为之自豪的一切，转眼之间就被浩浩荡荡相拥而至的大众文化所淹没。激情正在冷却，理想受到奚落，意义退出了文本，奢侈的语言却在叙事的死亡圈套中疯狂地膨胀。文化以一种按捺不住的亢奋从精神的寺院中还俗，终极价值与道义关怀普遍失落，而官能满足与欲望宣泄却与日俱增，自由长旅中的精神大纛业已为“好好过日子”的世俗性旗帜所替代，而那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英雄好汉们也兴高采烈、肆无忌惮地欢跳着渎神的语言舞蹈。与此同时，残缺萎靡的精英文化圈内，以颠覆与消解为目的的解构主义悄然潜入，正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为自己的杰作举行赏玩的庆典，而以认同和妥协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则背叛了自己的前身，贴上各式语言标签的脸上堆满着与大众文化握手言欢的笑眯眯的媚态……70 年代末期以来兴起和发展的、以政治激情和人文关怀为特征的新时期审美文化，就这样在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困境中，无可奈何地为自己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这是一片灿烂又迷茫、无限风光却又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化景观之所以会在世纪末最初几年内突然出现，并且迅速弥漫开去，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时代以恶作剧的方式将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发动者知识分子推向了社会的边缘地位。自从新时期开始以来，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的鼓舞与感召下，从十年文化专制的噩梦中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直处于一种寻找的激情与思想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主张政治开放，经济改革，要求确立个性的尊严、价值与自由，号召审视民族文化心理中阻碍社会进步的痼疾与偏颇，于是在政治热情异常高涨的 80 年代激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关注焦点与轰动效应。这是继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又一次进驻社会的中心位置，又一次真正充当大众的代言人与启蒙者的角色。长期的亢奋状态容易导致精神的疲惫，社会中心的显赫位置与启蒙者角色的回归也使长期以来处于文化压抑状态中的知识分子滋生着心理的自满与得意，因而，本来就缺乏强大的阶级依托，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其自身潜藏着的深刻的精神危机也就渐露端倪。话语专制的权威意识与导师心态在一代思想领袖的身上潜滋暗长，而急于占领自我话语阵地的青年斗士又是那样地浮躁冲动、睥睨一切却又哗众取宠。尽管知识分子并非 80 年代末期那场政治风波的中心角色，但是作为当代文化思想的策源地，这次风波的爆发无疑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与人文关怀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弱点与心理痼疾终于不可避免地来了一次总暴露。

历史毫不留情地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进行自我省思与审视的深刻要求，然而，时代还没有来得及提供这种反思的

时间与机会，它又被一种巨大的历史合力牵引着大步前行了。9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朝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方向奔去，在市场经济与商品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市民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开始表述自己的文化需求与文化观念。他们毫不掩饰地将市场经济的原则手段引进文化领域，文化创造由一种精神活动转化为一种产业行为，文化本身则转化为商品，消费是它的主要用途，利润是它的主要目的。为了消费与利润，市民阶级捧出了自己的文化英雄：流行歌手、大腕影星、时装名模与节目主持人。知识分子尚未从政治亢奋后的疲软状态中恢复过来，就蓦然发现自己又一次从社会中心退居到了边缘的位置。这次的边缘化经验是没有痛苦更没有摧残的，但它却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无边的困惑与手足无措的彷徨。一方面，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抛弃他们的正是自己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浪漫憧憬由此幻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明确地感觉到了，他们所崇拜与喜好使用的启蒙话语一夜之间已经失去了它的沉甸甸的历史分量，神圣庄严的启蒙话语不仅为启蒙对象自觉地拒绝，甚至成了启蒙对象嘲弄的把柄。自己所熟悉的话语系统已经为这个商品化的社会弃若敝屣，而对粗鄙浅陋的市民文化，知识分子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阐释它，因而，一向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普遍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中。正是这种失语状态，导致知识分子默认了这次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并从社会良知与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中全面撤出。在文化专制时代里，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地位，丧失话语的权利，要么缄默，要么反抗，没有别的出路可走。但以金钱为中心的商品社会，却非常大度地为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商品消费为依托的大众文

化早就为知识分子准备了招降纳叛的丰盛早餐。于是，知识分子在全面撤出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分化。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有些知识分子干脆像刘震云笔下的诗人“小李白”那样操起了卖板鸭的行当，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从大众文化趣味中找到了自己致富的灿烂前景，超乎常人的智商与聪明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角色的转变，由大众的代言人转换成为大众趣味的忠实的转述者。作为文化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与文化传播的主要发动者，知识分子不再为明天、为理想、为心头的梦、为人类的集体憧憬和终极价值而写作，而只是为今天、为世俗、为外在的利益、为适应市民社会的生活准则与审美趣味而写作，社会文化的创造无疑失去了它的灵魂与生命力，一个文化颓败的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这个文化颓败的时代里，软玉温香的流行歌曲唱遍街头巷尾，磨平着人们体内已经不可多得的喷张的血脉与粗粝的神经，无所附丽的性与暴力堂而皇之地走进严肃文学的殿堂，消释着大众内心无法放纵却又找不到升华出路的潜在情欲的躁动；繁荣的文化市场上虽然充盈着色彩斑斓的、注定要成为垃圾的消费商品，却无法掩饰其思想放逐、意义缺席的内在苍白与空虚……

确实，这种文化颓败现象是有相当大的迷惑性的，因为这种颓败的文化趋向恰是孕生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大环境之中，迎合着人们追求世俗性幸福的时代主题（小康梦），文化的颓败往往是在一种文化繁荣的保护色下潜滋暗长的。同时，由于有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次世纪末中国审美文化的颓败趋向是在一种非常自觉的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它的策略一方面是寻找自己的社会基础，挟大众以逐精英，另一方面则是雄心勃勃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为自

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寻找体系性的阐释，这从 90 年代许多标志着文化颓败倾向的文学作品被冠之以先锋派的美称在文坛招摇过市即可见一斑。所谓“后现代性”就成了这一理论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汇，那些流行的理论家们或者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指出“后现代性已经崛起，它已是我们无法驱散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状态”，因而自信与豪迈的失去，信仰与理想被厌倦与淡漠的取代，就成了 20 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宿命，知识分子只有退回到这一宿命中，从对语言和符号秩序的权力本性的强调和写作的快感里去寻找自己应该的存在方式。或者，他们把 90 年代中国文化置放于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中，指出文学写作的精英主义幻想的消失，是与全球性意识形态的消解进程相联系的，同时也与全球性的文化话语后殖民化息息相关，因为“第一世界的话语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后东方化’的进程，它变为大众传媒和高级文化领域里精致、优雅的消费品，使第三世界文化几乎完全被动地认同和屈从于它的神话”。在这些理论的阐释下，文化颓败的倾向从时间向度上似乎是历史之必然，从空间的向度上则似乎是与全球性文化行为所同步，因而，这种文化颓败的倾向往往被一些理论家视之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在语言视为游戏，理论成为商品的年代，一切都正在获得圆满的解释。

正是面对如此纷繁的理论状态，文化批判精神的张扬在世纪末的历史进程中才显得那么的重要。文化批判，这个充满挑战意味的字眼，由于十年浩劫时它曾被别有用心地捆绑在政治批判的战车上，因而名誉受到玷污。许多年来，人们已经不太习惯于它的锋芒了，但是，当 90 年代文化颓败的总体趋势正在获得种种文化理论的认可阐释时，确实也只有